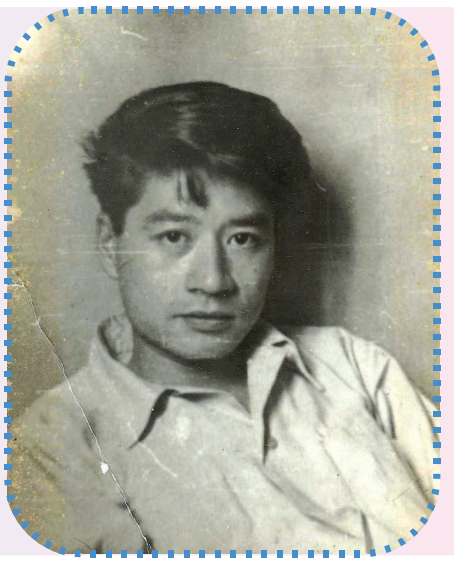
纪念

王道乾先生肩头的鸽子

陈青生

再一次到王先生家看望他是在1990年代初，这次聊天谈到他的翻译。我问他一天可以翻译多少字，他说“五百，我要求自己坚持每天五百字”。我听了有些惊诧，这么著名的翻译家，对法语那么精通，而且王先生并不热衷社会交际，怎么每天只翻译五百字，也就是写满当时文学所可以领用的一张大稿纸啊。



年轻时的王道乾先生

我和王道乾先生是在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认识的。1979年4月我进入刚刚恢复的上海社会科学院，文学所还在筹备之中，几个月后姜彬所长、王道乾副所长上任，文学所正式成立。这时，“文革”刚结束不久，“先生”、“女士”、“小姐”等称呼还没流行。文学所里对年长的同志，都习惯在姓氏前加“老”称呼，对王道乾先生大家都称呼“老王”，对姜彬所长也称呼“老姜”，人前人后莫不如此，他们都不以为忤。直到现在，文学所一些老同事谈到他们，仍称“老姜”、“老王”。我在这里称王道乾先生，是顺应现在的习惯。

第一次见到王先生，就被他的外貌所吸引：五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身板硬朗，方正脸型，茂密且根根直立的头发剪成像鲁迅那样的样式，浓眉大眼，戴一副金属框架的眼镜，鼻子比一般人高些，下巴微微凸前，乍看面相很像古希腊哲人。我心里暗想，难怪他是法国文学专家，说他就是法国人，也有几分相像啊。王先生衣着朴素得体，常年穿中山装，偶尔也穿中式上装，待人总是彬彬有礼，平时话不多，说起话来语气平和，不慌不忙，而文静中又带几分严肃。他不是那种乍接触就让人想亲近的人，但同王先生交往久了，会渐渐感觉到他待人的真诚、善良和热情。

文学所成立初期，社科院分配的办公室只有三间：三楼一小间是所长办公室，一楼有一大间，一百多平方米，供办公室、资料室、外国文学研究室和古代文学研究室使用；三楼屋顶平台上的简易房一间，将近五六十平方米。由理论研究室、现代文学研究室、当代文学研究室合用。由于王先生兼任外国文学研究室主任，所以他在一楼大房间的外国文学研究室区也安置了一张办公桌，待在这里的时间比在所长办公室要多。

那时，社科院特别强调学术研究队伍的“老中青三结合”，也强调老年学者对中青年学术后辈的“传帮带”，而青年科研人员也大多虚心向中老年学者请教。我向王先生求教可以说是随时随地，走廊里遇到可以，院门口见到可以，然而最多的是在一楼他的办公桌旁。文学所的科研人员每周二、五两天必须到所，或研究室活动或全所集会。遇到这两天，午饭后科研人员陆续离去，我就到一楼的外国文学室向王先生求教。王先生从不厌烦，即使我的问题太幼稚肤浅，他也是有问必答，有求必应，并且针对我的欠缺指导弥补。这样的求、教慢慢多起来，我们的关系也由生疏变得比较熟悉，这当然承蒙王先生不弃。王先生吸烟，那段时间好像经常吸烟斗。讨教时，我隔着办公桌坐在他的对面，他边吸烟斗边说话，用左手的拇指、食指和中指夹握住烟斗，将烟斗的吸嘴部轻轻放进嘴唇的左角，慢慢吸上一口，烟斗里的烟丝随之闪亮微微的红光，蜜糖般的甜香飘溢四散，他缓缓吐出淡淡的青白色烟雾，在两人间形成一层轻薄的烟帘，透过它我看到慈祥的面容和深邃的目光，听到轻柔徐缓又清晰中肯的言谈。

我们谈过学术研究的兴趣，王先生说，治学离不开兴趣，但不能当成游戏，要有敬畏心、责任感。我们也谈过研究的视野、角度等问题，王先生说，学术研究也没什么神秘的或者规定的视野、角度，就好像切蛋糕，你怎么切都行，但你要讲清为什么这样切、这样切你发现什么、有什么好处等等。有一次我说起所里一位中年学者的词汇量特别多，文章写得华丽，要向他学习，王先生说质朴也是风格，他喜欢质朴的文字。王先生督促我学习逻辑，说掌握逻辑思维方法，是研究学术的基本要素之一；还说，在西方中学就有逻辑课程，而中国要到大学才讲授逻辑，这是不应该的。我问他中国哪位学者讲逻辑最好，我从哪本逻辑著作读起。王先生说，金岳霖研究逻辑是好的，建议我先读苏联学者罗森塔尔的《形式逻辑》。在这次谈话之后一星期再见到王先生时，我说没找到这部书，王先生听后没说什么。几天后，王先生找到我，递给我罗森塔尔的《形式逻辑》，说，“这是我自己的，你看时要当心，看完还给我”。我当天就开始阅读此书，越读越有兴趣，读了一遍又读一遍，然后还给王先生，还说了一些自己的阅读喜悦。在这本书里，有不少王先生的眉批，成为我学习逻辑的指引或参考。后来，我又结合阅读《资本论》读了罗森塔尔的《马克思〈资本论〉中的辩证法问题》等。王先生的这些教导让我受益终身。

王先生在所里分管青年科研人员培养工作，非仅对我，对文学所愿意向他求教的其他青年科研人员，他都不吝赐教。古典文学室有位青年科研人员，经常在中午找王先生“讨教”，王先生常常因此不能按时进餐，却从不拒绝，待这位同志“讨教”结束再去食堂。一位青年科研人员初进文学所，王先生写信给她，提醒她尽快适应生活环境、工作方式的变化，明确新的“社会责任已经落在肩上”，希望她“首先集中地抓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，不是做到略知一二，而是从体系上力争掌握起来”，还叮嘱她要有目的、有计划、带分析地广泛阅读中外文论和作品，希望她写读书笔记，重视学习和研究方法，不仅“要善于发现问题，敏锐地抓住”，还要“强制自己的思维活动按照严格的逻辑去进行。必须养成良好的健全的思维习惯”等等。当年参与文学所办公会议的一位同志告诉我，王先生对所里每位青年科研人员的工作规划逐一审阅，然后分别谈话，给以指导。我也听王先生说过，文学所每位青年科研人员上报的学术成果，他都找来看过。

王先生十分重视学识与学风建设。在文学所学术会议上或同我的交谈中，强调做学问要有深厚扎实的基础，要耐得住寂寞，甘于坐冷板凳，不要急于求成；他说学术研究不能赶时髦，不要曲意迎合，随波逐流；他说考据是必要的，是为了了解真实情况，但不能为考据而考据，不能满足于考据，考据要有史的观念，要为历史研究服务。他劝诫科研人员不要热衷在报刊发表“豆腐干”文章，研究要有长期规划，选择有意义有价值的课题，有阶段性目标；要敢于发表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，又要有能够听取不同见解的襟怀气量，等等等等。那时，继恢复稿酬制度之后，全民经商的“下海”大潮正波涛涌动，这些治学的老生常谈，对于文学所优良学风的建立和青年科研人员的健康成长，都是矫枉扶正的金玉良言。

在我心目中，王先生是学者，是老师，也是父辈。因此，我们的交谈也并非总限于学术工作。我也向王先生“诉过苦”。1980年代初期，社科院恢复评定职称，规定同学历挂钩，“文革”期间的“工农兵大学生”一律视为大专学历，实习研究员任职五年方得申请晋升助理研究员；如果是“大专”学历的，不仅每年完成的工作量必须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的一倍，而且五年间必须年年如此。我是“文革”末期上海高校“试点研究生班”毕业的，同样被定为大专学历。我在院内第一批定为实习研究员，每年的工作量达到甚至超过规定的一倍以上，但以后申请晋升职称一样有学历问题的困扰。于是，我想暂停研究工作，报考高校研究生。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王先生。他对我说：这样的规定的确不够公平，但不公平的事哪里都有，哪里都一样；做学问，归根结底还是看实际能力和成果；你的那篇讲“孤岛”时期上海电影情况的文章，就有硕士论文的水平；与其花几年时间拿个硕士学位，不如用这些时间好好研究课题，写几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。他还说：“文学所是我最后的工作单位，没几年我就要退休了，你就在这里陪陪我吧。”就是王先生的这一席话，让我打消了报考高校研究生的念头，在随后几年里，专心进行创造社研究和“孤岛文学”研究。然而，为了解决学历问题，在王先生去世之后，我还是不得不通过在职学习，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。

我和王先生经常中午一起在社科院食堂吃饭。那时，社科院食堂的午餐通常有六七种荤菜与素菜，主食有米饭、面条、馒头、包子等，在当时还算丰盛。王先生的午餐有他的“标配”——四个肉包和一碗菜汤，总共贰角钱。如果没买到肉包，就吃面条或馒头。我问他是不是喜欢面食，他说是，也因为肉包进食方便，节省时间。如果午间有事或与他人谈话不能按时进餐，他会递给我食堂的代价券，让我帮他先买好“标配”在食堂等他。有时“标配”已经凉了他才赶来，也毫不讲究地慢慢进餐。吃饭时，往往都不多

（下转3版）

策划：
文汇报理评部
执行编辑：
李纯一 licy@whb.cn
封面编辑：
陈韶旭 csx@whb.cn
封面图片：
法国画家罗伯特·德劳内《巴黎城、女性与埃菲尔铁塔》(1925，局部)。德劳内夫妇的画作正在蓬皮杜×西岸“时间的形态”常设展上展览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，关注文汇学人